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系列学术著作

公元前2千纪的 晋陕高原与燕山南北

杨建华
蒋刚 主编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公元前 2 千纪的晋陕高原 与燕山南北

杨建华 蒋 刚 主编

科 学 出 版 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对公元前2千纪晋陕高原与燕山南北考古学文化的综合性研究,系统地梳理了公元前2千纪晋陕高原和燕山南北的考古学文化编年、谱系和文化结构,并从陶器、青铜器等专题研究的角度,全面阐述了公元前2千纪晋陕高原与燕山南北的文化变迁以及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

本书适合考古学、历史学、北方少数民族史等学科的研究人员及高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元前2千纪的晋陕高原与燕山南北 / 杨建华, 蒋刚主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8

ISBN 978-7-03-021932-9

I. 公… II. ①杨…②蒋… III. 考古—中国—公元前2000年
IV. K87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67030号

责任编辑: 宋小军 曹明明 / 责任校对: 刘小梅

责任印制: 赵德静 / 封面设计: 王 浩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8年5月第 一 版 开本: B5 (720 × 1000)

2008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8 1/2

印数: 1—1 500 字数: 360 000

定价: 8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科印〉)

本书是吉林大学精品项目“商周时期的中原文化与晋陕高原和燕山南北的北方文化”(2004JP004)的最终成果

该成果得到“吉林大学‘985工程’项目——中国边疆史地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资助

序

公元前2千纪大体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夏代、商代和周代初期。在中原王朝的北方，包括河套地区在内的晋陕高原和燕山南北地区，它们位于太行山的東西兩翼，成为夏商王朝的西北方与东北方。考古遺存和历史文献都证明兩地有着較多的联系。公元前2千紀的北方地区，根据文化的自身发展可以分为以公元前1400年为界的早晚兩期，早期相当于夏代与早商，中原商文化的二里岗上层的北上导致了北方文化早期的解体；晚期为商代中晚期。中国北方从早期各地独立的发展并与草原和中原建立南北向的联系发展到晚期北方地区之间东西向联系的加强，广泛分布着北方地区特有的青铜器和花边口沿裝飾的陶器。这一变化的过程正是本书所要探讨的内容，我们将从北方地区自身的发展、相互的影响以及与中原和草原地区的交往等几个角度进行研究。

对晋陕高原与燕山南北的研究，我们首先是对东、西兩区公元前2千紀的考古学文化的编年、谱系和文化格局作一个总体的把握，这其中包括了对许多遺存的梳理，并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最终建立一个时空框架。

西部的晋陕高原包括南流黄河兩岸、河套地区和晋中地区，它们构成夏商王朝的西北方。这一地区在龙山晚期到夏代前期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文化面貌非常一致，最有代表性的陶器就是双鬲，在陕北的新华遺址、内蒙古的大口二期遺存和朱开沟遺址的早期以及山西忻州的游邀与晋中的杏花遺址，都广泛分布着这种陶鬲，与这种陶鬲共生的是斂口甗和斂口空三足瓮。《晋陕高原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格局研究》总结了这一地区文化的一致性。

最开始从这个文化区中分化出来的是晋中地区，开始以高领鬲、敞口甗和实足根瓮为当地夏代文化特征。进入商代后，陶鬲演变为深腹鬲，并有商代二里岗上层典型陶鬲的出现。这些迹象表明，晋中地区已经慢慢融入商文化中，成为商王朝的一个友好方国。《晋中地区与晋陕高原及中原文化的关系》分析了这个分化的过程。

进入夏代晚期，内蒙古河套地区以双鬲为代表的文化被大袋足蛇纹鬲遺存所取代，与蛇纹鬲共出的还有口沿带鬲纽的圆腹罐和敞口甗。《晋陕高原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格局研究》探讨了朱开沟遺址双鬲与蛇纹鬲的区别。二里岗上层文化北上到朱开沟遺址，结束了这里蛇纹鬲为代表的朱开沟文化。但是蛇纹鬲并没有就此消失，而是沿长城地带向西和向东传播。《朱开沟文化因素的东传》揭

示了它的东传过程以及对燕山南北的影响。

进入晚期以来,在蛇纹鬲之后又出现了一种曲颈高领柱足鬲,构成了南流黄河两岸晋陕高原的李家崖文化与河套地区的西岔文化的主要特点。《两种“花边鬲”的辨析》详细分析了这类遗存之间的联系。花边鬲遗存与同时期的北方青铜器体现了这时期各地的北方文化之间出现了密切的交往。

总之,西部晋陕高原的公元前 2 千纪的考古学文化的变化主要就是双鬲鬲—蛇纹鬲—高领鬲的变化,晋陕高原由统一的文化区逐渐分成晋中地区、河套地区和南流黄河两岸三个小区,每个区在不同的时期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青铜器:河套地区蛇纹鬲时期出现了朱开沟文化的青铜器,晋中地区在晚商时期出现了以灵石旌界墓葬为代表的青铜器,南流黄河两岸在晚商至西周前期出现了石楼类型和保德类型青铜器。其中对石楼与保德青铜器的研究有四篇文章。《晋陕高原商周时期青铜器分群研究》一文是从南流黄河两岸的北方青铜器的组合入手,分为石楼与保德两个类型;《南流黄河两岸出土青铜器的年代与组合研究》是在类型划分的基础上,从共生的中原青铜礼器的组合讨论了两个类型与中原文化关系的区别与联系;《试论“勺形器”的用途——兼论晋陕高原商周时期青铜器的武装化与移动化》是从以往被叫做“勺形器”的功能分析入手,确定了它是一种年代很早的马镫,并讨论了马镫出现的历史意义;《商周长体刀起源再研究》从长体刀的分类与各类的起源看中原文化和草原文化对这一地区的影响。西部的南流黄河两岸、晋中地区和河套地区与中原的夏商文化的亲疏是不同的,它们的发展与分化可以用最常见的陶鬲的变化来表示(表一)。

表一 南流黄河、河套地区和晋中地区夏商时期常见陶鬲变化表

年代\地区	南流黄河	河套	晋中
龙山—夏代	双 鬲 鬲		
夏代	?	↓	高领分档鬲
夏代晚—早商	↑	蛇纹鬲	深腹袋足鬲
晚商	曲颈高领柱足鬲		小袋足鬲

东部的燕山南北地区首先是通过《燕山南麓夏至早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编年、谱系与文化格局》一文,梳理了各种遗存以及各种观点,建立了这一地区的年代标尺。在这个基础上对各地进行了一些专题研究。其中主要集中在燕山以南的研究。《试论冀北地区夏至早商时期的外来文化及其影响》是对这一地区夏至早商时期来自北面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来自南面的商系统的文化对当地影响的研究;《朱开沟文化因素的东传》是对来自西部文化影响的研究;《浅析镇江营与塔照遗址的两种陶鬲制作方法》是一个专题研究陶器制法的文章,为我们讨论这一地区各时代的土著文化的谱系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商末周初:围坊三期文

化与张家园上层文化》是对人们关注的围坊三期与张家园文化上层文化关系提出的新见解。

东部地区以永定河为界分为两个小区。这两个小区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以及与中原文化关系方面有很大不同。永定以西的壶流河、桑干河、洋河和拒马河流域，与南部的中原文化、西部朱开沟文化以及北部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相邻，受到外来文化影响比较多；永定河以东的海河和滦河流域相对比较封闭，文化自身传统稳定。在公元前2千纪前期，东部地区的大折腹鬲、小折腹鬲、筒形鬲和尖锥状袋足鬲分别代表了永定河以西、永定河以东、燕山以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先商文化的传统，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先商文化主要活跃在永定河以西地区，文化之间的交往主要是南北向的往来。进入晚期阶段，来自西部的文化影响成为主要的发展态势。《朱开沟文化因素的东传》探讨了来自河套地区的文化对燕山南北的影响，这次传播打破了永定河的界限，花边鬲广泛分布于海河与滦河流域，锯齿状附加堆纹和叠唇带状花边的两种花边鬲分别构成了围坊三期与张家园上层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晋陕高原的文化第一次传到了东部平原，它的分布地带与战国的长城沿线大体重合。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这两个发达的青铜文化之间，以西来文化为主的外来文化影响的传入使得燕山以南和以北形成了以围坊三期和魏营子文化为代表的遗存，同时燕山南北的青铜器出土的非常多，反映了中原文化、土著文化与草原文化的影响。《燕山南北商周之际青铜器遗存的分群研究》是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虽然文章已经在《考古学报》上发表，但是为了体现本书研究的完整性，还是收录在这里。

在对两个地区分别进行了研究的基础上，本书进一步探讨了公元前2千纪后期陶器与青铜器的趋同性。《商周时期中国北方冶金区的形成——商周时期北方青铜器的比较研究》是对东、西部青铜器的比较，并把它放在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的大背景来考察，提出中国北方商周时期有一批独特的青铜器，并对草原文化产生了影响，是一个独特的冶金区，而晋陕高原与燕山南北则是这个冶金区的两个冶金中心，它的产生是以商代晚期发达的青铜铸造业为依托的。《两种“花边鬲”的辨析》通过区分叠唇带状花边与锯齿状附加堆纹的两种花边鬲说明北方文化相互联系的发展过程以及东西部的差异。《夏商西周文化对晋陕高原、燕山南麓北方青铜文化的影响》论述了中原文化对北方地区的文化渗透历程，并对中原对太行山两翼经略方式进行了比较研究。

从考古学角度研究公元前2千纪的中国北方，本书主要是从常见的陶器和青铜器的变化来揭示这个地区的历史。经济类型、社会发展阶段和人种等诸多方面尚待深入研究。中国北方是一个既不同于中原又不同于草原的土著文化带，本书所涉及的时期正是这个文化带的初始阶段，并在商周之际达到第一个高峰。

本书涉及的内容是笔者长期以来思考的问题，笔者将有些问题交由学生作为

他们的论文选题，逐渐积累成了这本书，书中每篇文章的观点不尽相同。虽然有些问题还缺乏更深入的研究，有些观点还有待更多的发现来证实，但是文章所讨论的问题都是目前很有意义的，或许会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本书作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精品项目得到了学校资金的支持，并得到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资助得以出版。在论文的写作期间，笔者有幸参加国家文物局《河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的文化、生业与环境研究》项目，受益匪浅。邵会秋博士为本书的插图做了许多的修改。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杨建华

2007 年 4 月 28 日

目 录

序	(i)
第一部分 晋陕高原	(1)
晋陕高原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格局研究	(3)
晋中地区与晋陕高原及中原文化的关系	(44)
晋陕高原商周时期青铜器分群研究	(56)
南流黄河两岸出土青铜器的年代与组合研究	(68)
试论“勺形器”的用途——兼论晋陕高原商周时期青铜器的武装化与 移动化	(85)
商周长体刀起源再研究	(93)
第二部分 燕山南北	(109)
燕山南麓夏至早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编年、谱系与文化格局	(111)
试论冀北地区夏至早商时期的外来文化及其影响	(148)
朱开沟文化因素的东传	(153)
浅析镇江营与塔照遗址的两种陶鬲制作方法	(165)
商末周初：围坊三期文化与张家园上层文化	(173)
燕山南北商周之际青铜器遗存的分群研究	(198)
第三部分 各地区的比较	(219)
商周时期中国北方冶金区的形成——商周时期北方青铜器的比较研究	(221)
两种“花边鬲”的辨析	(256)
夏商西周文化对晋陕高原、燕山南麓北方青铜文化的影响	(262)
英文提要	(279)

第一部分

晋 陕 高 原

晋陕高原*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格局研究

赵菊梅

一、前言

本文所说的晋陕高原包括的区域主要有陕西省北部,山西省中、北部以及内蒙古中南部的河套与凉城岱海地区。该区位于黄河中游,地处高原,地表多覆盖深厚的黄土。由于断层作用及流水切割,岭谷交错,地形复杂。黄河自北向南从本区穿过,东西两侧隔河相望。河东的山西境内,东西两侧分列吕梁山、太行山两大主干山脉,中间自北向南分布着大同、忻定和太原三个盆地。晋北山地与内蒙古中南部的阴山山脉相连。河西的鄂尔多斯高原与陕北高原连成一片,北望河套平原,南邻关中盆地,西接陇东高原。这一具有地域性特点的地区,位于北方长城地带的中段,有着丰富的古文化遗存,是我国北方长城文化带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区域之一,也是中原地区和北方草原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因此,无论对于考古学文化的研究还是历史研究,它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为了探索长城地带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沿北纬40°的内蒙古、晋北、冀北、辽西地区夏商考古工作深入开展起来了。1974年,朱开沟遗址的发现和试掘揭开了对内蒙古中南部夏商时期文化研究的序幕。此后,鉴于朱开沟遗址的重要性,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于1977年、1980年、1983年、1984年先后四次对该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田野发掘。1984年,在苏秉琦先生的倡议下,召开了“内蒙古西部地区原始文化座谈会”,朱开沟遗址的材料表明,它无疑是解决鄂尔多斯地区龙山至早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的一把钥匙。自此以后,朱开沟遗址就成了学界关注的热点,并且引起了较大争议。以该遗址发掘者田广金等先生为代表的研究者主张朱开沟遗址所有遗存是一个整体,属于同一种文化,称之为朱开沟文化^[1]。田广金等先生新近发表的《朱开沟文化研究》^[2]一文甚至将该文化的范围扩展到了整个晋陕高

* 本文所说的晋陕高原与张忠培、朱延平、乔梁先生的《晋陕高原及关中地区商代考古学文化结构研究》(《内蒙古考古文集》,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一文中的晋陕高原所指的地理范围大体一致。

原,把这一广大地区内各具特征的夏商时期的遗存统称为朱开沟文化;而张忠培、崔璇等先生则认为朱开沟遗址的遗存可以分群,不属于同一种文化,其年代也不相同^[3]。近年来,在陕北及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发现和发掘的属于夏商时期的古文化遗址不断增多,如陕北的寨峁遗址^[4]、新华遗址^[5],准格尔旗的南壕^[6]、高家坪^[7]、寨子塔^[8]遗址,伊金霍洛旗的白敖包墓地^[9]以及凉城县杨厂沟遗址^[10]等,随着可以与朱开沟遗址相比较的材料的日益丰富,我们对朱开沟及其相关遗存进行重新分析和认识已成为可能。

晋中北地区夏商时期的考古遗存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大多属于零星发现,如光社遗址^[11]的调查,太原许坦石棺墓群^[12]的发现,太原狄村、东太堡出土的陶器^[13]等。大规模的田野考古工作开始于 1980 年由国家文物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吉林大学考古专业联合组成的晋中考古队对太谷白燕遗址^[14]的发掘。此项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使人们对晋中地区古文化的认识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同时也提出了许多新的需要解决的问题。1982 年春,针对白燕遗址发掘提出的问题,晋中考古队又在汾阳与孝义、娄烦、离石与柳林、杏花村^[15]开展了有计划、有步骤的调查、试掘和发掘工作,从而认识到晋中地区夏商时期的遗存是由当地龙山文化发展而来,且各具特征、序列完整,是一个相当稳定、独立的考古文化区^[16]。继太谷白燕工作和晋中考古调查之后,为了继续探索先秦时期北方地区考古学文化的谱系课题,1987 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及忻州地区文物管理处与吉林大学北方考古研究室再度合作,对忻州游邀遗址^[17]进行了发掘,从而为认识忻定盆地古代文化的面貌、年代序列和谱系关系提供了一些新线索。

在晋陕高原夏商时期的古文化遗存的研究中,对某一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进行的谱系研究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如《河套和岱海地区夏商时期文化初探》^[18]侧重于对内蒙古中南部夏商时期文化的分期、面貌和性质的探讨,此外,还有若干文章对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进行了研究^[19]。《陕西榆林地区夏代文化遗存考察》^[20]仅就陕北地区的材料作了大致的梳理。《晋中报告》^[21]的结语部分和《晋中地区西周以前古遗存的编年与谱系》^[22]以及《晋中地区夏时期考古遗存研究》^[23]则对晋中北地区古文化遗存的分期与编年、源流与结构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晋陕高原及关中地区商代考古学文化结构研究》^[24]对晋陕高原商时期遗存进行了综合性的宏观的分析,着重讨论了它们与中原地区商文化之间的关系。

上述研究工作大体上勾画出了本区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基本面貌,大致排出了晋陕高原的文化发展序列,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但是,对于这一地区夏商时期的考古遗存,目前的研究仍大多限于从本省、本地区的情况出发进行总结,或者对单一文化进行谱系研究,缺乏对晋陕高原夏商时期遗存的全面考察和地区间的综合研究。另外,在对某些遗存的认识方面也还存在着许多差异。本文拟结合以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对该地区内已经发现的夏商时期的文化资料

作全面梳理,追溯其发展脉络,考察其发展历程,从龙山时代存在的统一的文化圈的视角分析晋陕高原夏商时期文化格局的演变,并对这种变化的原因和意义进行初步的探讨。

二、区的划分

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龙山时代的晋陕高原考古学文化面貌呈现出了很大的一致性,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域。不少学者对此都多有论述^[25],他们认为内蒙古中南部、陕西北部、晋中、晋北和冀西北张家口地区以矮领胖袋足双鬲鬲为代表的遗存,在文化面貌上有着较多的一致性,从广义上讲,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范畴,或者可以视为一个大的文化区。《晋中报告》的结语也指出:“如果以双鬲鬲在遗存中占着显著位置为标准划分考古学遗存的话,则可见到(晋中)V期这类遗存的分布情况是:西起陕晋境内的黄河西岸汇入黄河的支流,北达阴山脚下,南至侯马、河津一带,……可见,它以汾河为中心,广布于黄土高原的东半部。不同地区的这类遗存,由于传统,尤其是同邻近地区不同性质的同期文化交往方向及疏密差别,形成了彼此差异的地域因素。”^[26]

考察晋陕高原龙山时代晚期夏代初期这一大的时间范围内的考古学文化面貌,我们会发现,这种一致性是由以双鬲耳为特色的鬲、甗、斚、盃、三足瓮、折肩罐、大口尊等器物构成的陶器群作为主要标志的(图一,1~31)。当然,各地区存在的差异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比较内蒙古中南部、陕北、晋北、晋中四个地区龙山晚期到夏代早期的考古学文化,可以看出,各地遗存由于与不同考古学文化的接触,不同地区的考古遗存差别越来越大。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晋陕高原的考古学文化甚至发生了分野现象,不同区域的考古遗存面貌发生了质的变化。在内蒙古中南部的朱开沟^[27],陕北的寨峁、新华等居住遗址中,除鬲手鬲之外还有一定数量的花边鬲(图一,32、36)、盆形大袋足鬲(图一,33、37)和单把鬲(图一,38、39),朱开沟、伊金霍洛旗白敖包和石峁遗址^[28]的土坑墓遗存中则以单把鬲(图一,34、35)、双耳罐(图一,44、48)、单耳罐(图一,45、46、49)、壶(图一,47、50)等为主要特色。晋北地区的遗存除具有前述晋陕高原所共有的文化因素之外,忻州游邀遗址 H193:1 到 H3:1(图一,3、40)的变化表明此地的矮领胖袋足鬲手鬲有向高实足根鬲发展的趋势。同时,阳白^[29] H202:5 瓮式斚、游邀 H326:3 尊式斚、阳白 H107:23、唐昌^[30] H1:1 粗把镂空豆等(图一,51~54)表现出了该地区强烈的地方特色。晋中地区在此时期相对比较稳定,其陶器群主要是当地龙山时期遗存的发展和继续,但汾阳峪道河 H1:1(图一,42)也表明此地鬲手鬲的双鬲开始蜕化,并向高领鬲发展。此外,晋北、晋中两地区原来少量存在的单把鬲(图一,41、43)数量更少,并走向了

器型 地区	握手鬲	敛口甗	三足甗	罍	盃	折肩罐	大口尊	高	其他器物
内蒙古中南部	1 	5 	13 	16 	22 	25 	29 	32 33 	44 45 46 47
陕西北部	2 	7 8 	14 	17 18 	23 	26 	30 	36 37 	48 49 60
晋北地区	3 	9 10 		19 	24 	27 	40 41 	38 39 	51 52 53 54
晋中地区	4 	11 12 	15 	20 21 		28 	31 	42 43 	

图一 晋陕高原龙山晚期夏代初期各区陶器比较图

1. 朱 W2002:1 2. 新 H108:1 3. 游 H193:1 4. 临 M1:1 5. 朱 W2002:2 6. 大 DKW6:1 7. 寨 AT4011②:7 8. 寨 AH60:17 9. 游 H326:1 10. 游 H326:2 11. 乔 H6:29 12. 乔 H6:6 13. 朱 H2058:1 14. 新 H115:1 15. 峪 W2:1 16. 朱 W2003:1 17. 石卯采集 18. 石 M2:7 19. 游 H551:2 20. 杏 H123:3 21. 乔 H6:3 22. 朱 T236⑤:2 23. 新 F3:2 24. 游 H176:1 25. 朱 W2013:1 26. 新 F22:1 27. 游 H3:2 28. 乔 H4:20 29. 大口采集 30. 新 H83:1 31. 峪 W3:4 32. 朱 T209④:1 33. 朱 T249⑤:2 34. 朱 M2001:1 35. 朱 M1060:3 36. 寨 AT4011③:7 37. 新 H116:3 38. 寨 CT1704②:2 39. 新 F17:5 40. 游 H3:1 41. 游 05 42. 峪 H1:1 43. 杏 H6:4 44. 朱 M2020:3 45. 朱 M1060:1 46. 白 M15:6 47. 朱 M2026:2 48~50. 石卯征集 51. 阳 H202:5 52. 游 H326:3 53. 阳 H107:23 54. 唐 H1:1 (其中朱指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 新指神木新华遗址, 游指忻州游邀遗址, 大指准格尔旗大口遗址, 寨指神木寨峁遗址, 乔指离石乔家沟遗址, 峪指汾阳峪道河, 石指神木石卯遗址, 杏指汾阳杏花村遗址, 白指伊金霍洛旗白敖包遗址, 阳指五台山阳白遗址, 唐指原平唐昌遗址)

消亡。由此可以看出,内蒙古中南部和陕北地区的文化面貌明显具有较多的一致性,能够划分为一个文化区,而晋中、晋北地区的文化面貌和它们之间出现了较大的差异。显然,晋陕高原原来统一的格局开始解体,各区文化走向了分化。根据各地区文化面貌的不同,我们可以将晋陕高原大致划分为三部分即内蒙古中南部及陕北区、晋中区和晋北区。

上述变化无疑揭开了下一个阶段不同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向着不同方向发展的序幕。由于这一时空范围内的各种文化头绪纷繁,面貌复杂,为了更清楚地展示这一发展过程,下面我们从内蒙古中南部、陕北地区、晋中地区和晋北地区各自的考古遗存入手,逐步论及晋陕高原夏商时期文化结构的整体面貌。

三、各区考古遗存的面貌特征

1. 内蒙古中南部及陕北地区

这一地区我们将在前人研究工作的基础上,重点对朱开沟及其相关遗存做些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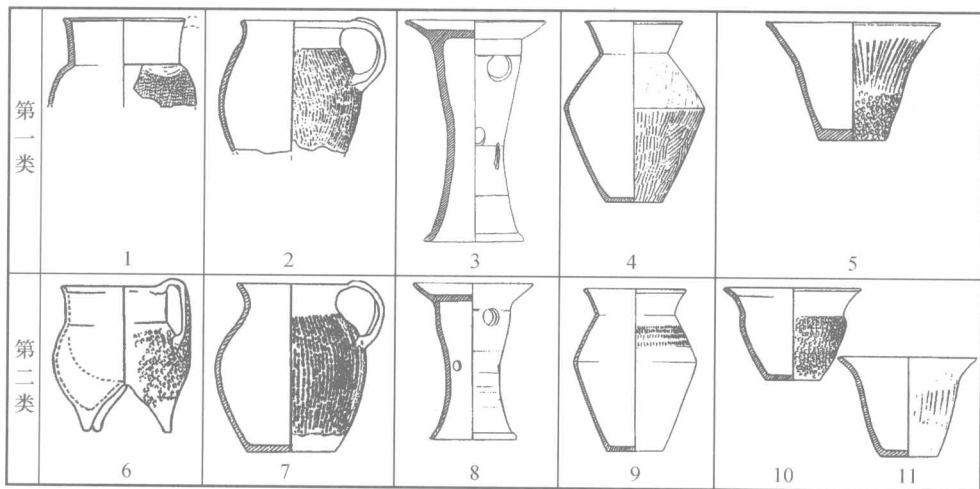
(1) 朱开沟及其相关遗存的分类

在详细研究了朱开沟遗址的所有遗存后,我们认为该遗址的遗存是可以分群的,它们不属于同一种文化,其年代也有差别。我们从朱开沟遗址陶器的共存关系、器物类型学分析及遗存的分布等角度入手,认为朱开沟遗址的所有遗存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盩手鬲为代表的 W2001、W2002、W2003、W2013、F1018、H2058 等瓮棺葬及居址遗存;第二类是以单把鬲为代表的 M2001、M2020、M1060、M1063、M3024、M6018、M6011 等土坑墓遗存;第三类是以蛇纹鬲为代表的 H1058、QH79、W2004、M1027、M1064、M2012 等居址、瓮棺葬、土坑墓遗存。上述三类遗存的代表性器物及组合情况见表一,对比三类遗存的器物组合,我们发现,第二类遗存中的部分器物如带流盂、单把鬲、单耳罐、大口尊、高领罐等也见于第一类遗存中,第三类遗存的陶器除花边鬲之外与第一、第二两类遗存却是泾渭分明,绝无混同。此外,比较原报告中对上述陶器陶质、纹饰等方面的描述,也会发现,三类遗存具有一定的差别:第一类以夹砂陶为主,纹饰多篮纹、绳纹;第二类以泥制陶为主,纹饰多方格纹、篮纹;第三类以砂质陶为主,多绳纹,不见篮纹、方格纹,器表流行装饰蛇纹,口沿带凸纽等。如果将前两类遗存中的同类器物进行比较(图二),可以看出,单把鬲、单耳罐、豆、高领罐、大口尊等,这些在第二类遗存中出土较多的器物,虽然在第一类遗存中出土数量不多,但它们的相似性是显而易见的。另外,我们再将第一类和第二类遗存出土数量都较多的带流盂进行分析。根据口沿处的不同,两类遗存中的带流盂均可分为 A、B 两型:A 型口沿至折肩处的中部有一凹槽,B 型口沿至折

肩处器壁斜直无凹槽，而且两类遗存中的两型器物在各期中基本是同步发生变化的（图三）。据此，我们认为前两类是同一文化的两种遗存，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异应是同一群人在生活中使用的器物和死后随葬器物的差别。这种差别的存在，导致形成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类遗存。在这里，我们将第一、二类遗存合并，统称为朱开沟 A 类遗存；而第三类遗存应是另一类型的文化，我们将其称为朱开沟 B 类遗存。

表一 朱开沟遗址三类遗存代表性器物及组合情况

器型 分类	鬲		瓮	甗	罐	盂	尊	其他
第一类	盞手鬲	花边鬲 单把鬲 盆形大袋足鬲	篮纹三足瓮	敛口甗	单耳罐、高领罐	带流盂	大口尊	豆、罍
第二类	单把鬲	花边鬲			单耳罐、高领罐、 双耳罐、花边罐双 (三) 大耳罐	带流盂	大口尊	豆、壶、三足杯、单耳碗等
第三类	蛇纹鬲	花边鬲折沿鬲	绳纹三足瓮	敞口甗	带纽罐、矮领罐			侈沿盆、豆、簋、戈等



图二 朱开沟遗址第一、二类遗存同类器物比较图

1. H1014:3 2. T246④:9 3. H2047:2 4. W2013:1 5. H2058:2 6. M3018:4 7. M1005:3 8. M2001:3
9. M3024:4 10. M3024:3 11. M6007:1